

王富 著

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

*Reflections o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富 著

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

*Reflections o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王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203 - 0587 - 7

I. ①后… II. ①王… III. ①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9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35 千字
定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基金青年项目《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项目批准号：
12YJC740100）最终成果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批评意识的缺失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歧途 ——后殖民翻译研究现状反思	1
第二节 本书写作说明	24
第一章 表征危机中的翻译研究	30
第一节 表征危机论	30
第二节 两种表征观暨表征危机反思 ——以中西方之间相互的表征观为例	44
第三节 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反思 ——从西方的伊斯兰表征史和翻译史说起	60
第四节 战略本质主义与后殖民译者身份定位 ——文化认同危机的出路	77
第二章 权力转向中的翻译研究	83
第一节 权力转向	83

第二节	高权势低语势文化对低权势高语势文化的翻译 ——语言势差论下翻译的非殖民性	96
第三节	权力转向反思	123
第三章	后殖民翻译策略反思	135
第一节	仅以伦理态度能区分异化和归化翻译吗 ——评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归化论	135
第二节	文化认同与归化策略 ——从中国伊斯兰汉译说起	146
第四章	翻译的归宿 ——文化杂合及其中的非文化殖民性	174
第一节	翻译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174
第二节	中西翻译的文化杂合	191
第三节	共有系统论下的中华文化圈翻译 ——中西方强势文化异同比较与反思	213
结语	定位翻译及其文化战略 ——重建后殖民翻译文化诗学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32

导 论

第一节 批评意识的缺失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歧途

——后殖民翻译研究现状反思

一 后殖民翻译研究现状综论

最近 30 多年以来，翻译研究转的文化转向，使得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形成了紧密的关系。随着文化转向研究的深入，翻译研究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开始关注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问题。翻译研究和后殖民文化研究之间存在诸多联系，二者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已经引起了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共同关注。后殖民翻译研究成为后殖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殖民批评家无不通过翻译来佐证和论述自己的后殖民思想；后殖民主义思潮对翻译研究的渗入，进一步深化着后殖民研究和翻译研究，导致了后殖民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文化研究致力于全球化和民族身份的研究，

“这个焦点，连同近年来文学的后殖民研究真正的火爆，意味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日益变成跨文化或多文化。更具体地说，鉴于对后殖民文学和批评的广泛兴趣，这一翻译现象可定义为后殖民转向”。^① 后殖民翻译理论从文化殖民角度出发，借用解构理论研究翻译现象，对翻译实践进行各种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是建立在解构理论、多元系统论和新历史主义等基础上的新范式，是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下建构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念、判断及喻说，其知识谱系可追溯至后殖民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那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斯皮瓦克（G. C. Spivak）也卓有建树。英国学者鲁滨逊（Douglas Robinson）首先将“后殖民主义译论”作为一个问题正式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蒂莫志科（Maria Tymoczko）等人也做出了相应贡献，开创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此外，以色列伊凡·佐哈尔（Itamar Evan - Zohar）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巴西坎波斯兄弟（Haroldo & Augusto de Campos）的“食人主义”（Cannibalism）翻译理论，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归化异化论等也可以涵盖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之下进行考察。至此，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异军突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空间，构筑了新的范式。

在当代后殖民翻译研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拉斐尔（Vicente Rafael）的《缩减殖民主义：早期西班牙统治下他加禄社会中的翻译与传教》（*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① Bo Pettersson, "The Postcolonial Tur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Reviewed" (http://www.uqtr.ca/AE/vol_4/petter.htm).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l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1988)、切菲茨 (Eric Cheyfitz) 的《帝国主义的诗学》(*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 1991)、尼南贾娜的《为翻译定位: 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 - 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1992)、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1993)、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 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和《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 1992)、鲁滨逊的《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1997)、杰克蒙 (Richard Jacquemond) 的《翻译与文化霸权》(*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兰姆伯特 (Jose Lambert) 的《文学、翻译与非/殖民化》(*Literatures, Translation and (De) colonialization*)、巴斯内特和特立维第 (Harish Trivedi) 合编的《后殖民翻译: 理论与实践》(*Post - 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蒂莫志科的《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99) 及论文《后殖民书写与文学翻译》(*Post - 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9)、迈赫莱斯 (Samia Mehrez) 的论文《翻译与后殖民经验》(*Transl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Experience: The Francophone North African Text*)、西蒙 (S. Simon) 和圣皮埃尔 (P. St - Pierre) 合编的《变换术语: 后殖民时代的翻译》(*A Brief Review on Changing the Term: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0)、埃利斯 (Roger Ellis) 和奥克利 - 布朗 (Liz Oakley - Brown) 合编的《翻译与民族: 英格兰的文化政治》(*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ness, 2001)、赫尔曼斯 (Theo Hermans) 的《操纵文学》(*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85) 和《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 (II) 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2002), 等等。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和前沿课题之一。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在其《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中指出, 翻译研究的未来无疑会在后殖民文化上取得学术增长点。^① 杰里米·芒迪 (Jeremy Munday) 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Practice*) 说: “20 世纪 90 年代, 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如有以雪莱·西蒙为首的加拿大翻译和性别研究、由埃尔斯·维埃拉 (Else Vieira) 倡导的巴西食人学派、以孟加拉国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和佳娅特利·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美国, 劳伦斯·韦努蒂的文化研究导向的分析, 致力于捍卫译者的事业。”^② 芒迪上述的学者群正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根茨勒和蒂莫志科指出, 这是当前翻译研究令人兴奋的增长点之一, 聚焦权力与殖民主义的研究大量出现。^③ 赫尔曼斯、鲁滨逊、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等

①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95.

②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4.

③ Mariam Tymoczko, Edwin Gentzler (eds.), *Translation and Pow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xxvii.

也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前沿性做过类似的预测。^① 所有这些说明, 后殖民翻译研究正在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与后殖民研究的翻译转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埃德温·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杰里米·芒迪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等著作部分涉及后殖民翻译理论。根茨勒把后殖民翻译研究看作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继续, 并称之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芒迪则在《翻译学导论》第八章“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中设专节讨论后殖民翻译理论, 介绍了几位代表理论家的观点, 包括斯皮瓦克、尼南贾娜、迈克尔·克罗宁以及巴西维埃拉等的食人主义和蒂莫志科等的爱尔兰语境下的后殖民翻译, 并认为翻译研究与后殖民理论的核心交点, 就是权力关系 (Power Relations)。^② 根茨勒和芒迪都在其相关著作中设独立章节讨论了韦努蒂的解构主义或后殖民翻译理论。

二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根基备受诟病

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石, 学界对它们的批评直接动摇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基础。

佩特森指出, 后殖民批评“神圣三剑客”盖茨 (H. L. Gates, Jr.)、斯皮瓦克和巴巴直接或间接地对后殖民翻译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但应该检测他们的理论起点。很明显, 20 世纪是文学研究的文

^① See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4;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5;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94.

^②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New York, 2001, p. 134.

本性世纪：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均是如此。神圣三剑客如此写作就在于他们深植于这个传统。但他们及全世界受他们影响而产生的批评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理论基础不稳定的学术批评多充斥着行业术语，不切实际且在道德上也是可疑的说教，以致文学研究在其他学科之中如此声名狼藉。看到那么多学者都被后结构主义架构和术语所冲击，特别令人悲哀。西蒙（1999）与蒂莫志科（1999）是以后结构主义架构为基础的，巴斯内特和特立维蒂编辑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是如此，编者还援引了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在该文集中，分歧最大的是达哈沃德克（V. Dharwadker, 1999）。他试图证明本土学术与西方文学研究、语言学与人类学传统杂交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成果。在此过程中，达哈沃德克积累了大量的证据来反驳尼南贾娜（1992）对拉玛奴彦（K. Ramanujan）的批评，似乎有效肢解了尼南贾娜的后结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检测本杰明与德里达的翻译主张时，达哈沃德克弄清了尼南贾娜理论化的真相。因为拉玛奴彦的实践，本杰明与德里达的主张变得狭隘而毫无用处。而且在后殖民批评中，杂合的笼统概念毫无用处，因为殖民/后殖民的具体语境存在着巨大差异。总之，后殖民翻译研究现在至少需要以下几点的联合：理论的折中主义，以便多元系统论、目的理论等流派能够被利用；个案研究能够坚实地基于社会文化的实地考察；跨学科的开放性能够与民族志、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相关联。我们现在需要承认的是文学交流和翻译的复杂性。现在要求的是更宽广的架构，能用来解释文学交流

中的具有原创性、居间性、接受性和文本性的方面。^① 美国翻译学家根茨勒的《翻译、后结构主义与权力》一文矛头直指当前译学界对解构主义的滥用。在他看来,美国译学界的解构主义已经走偏。解构主义和翻译的本质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性。解构主义声称不介入政治,不迷信作者权威。但韦努蒂的理论介入了政治,而莱文(S. J. Levine)的翻译则充分利用了作者的权威。根茨勒认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与其说是后现代的,不如说是现代派的;与其说是解构主义的,不如说是结构主义的。为了使自己跳出没有政治的后结构主义和没有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的两难境地,根茨勒把目光投向了斯皮瓦克,认为其“战略本质主义”翻译观更接近解构主义,反映了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诉求。斯皮瓦克的翻译理论政治性很强,但她不像韦努蒂那么偏激。她那建立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上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追求更多的是对身处殖民状态的贱民话语的等效理解,而不是对原文的本真体现,因为在她看来,那是不可能翻译出来的。^② 郭建中甚至认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能说是一种理论,因为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③

多元系统论把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强弱联系起来,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主要先驱。多元系统理论将文学和文化生活看作各种利益集团之

① Bo Pettersson, "The Postcolonial Tur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Reviewed" (http://www.uqtr.ca/AE/vol_4/petter.htm. 1992).

②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wer", in Mariam Tymoczko, Edwin Gentzler (eds.), *Translation and Pow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p. 195-218; xv-xvi.

③ 郭建中:《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上海科技翻译》1999年第4期。

间为权力而进行永恒斗争的场景。^① 爱尔兰、巴西、印度等国历史反映了翻译在后殖民语境中的角色，文化的强弱地位在翻译中更加凸显，为多元系统论提供了佐证。与远离政治因素的多元系统论不同，后殖民多元系统从少数民族和弱势文化的立场出发来探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是多元系统论的进一步发展。学界对多元系统论的反思同样适用于后殖民翻译研究。从后殖民视角来看，多元系统论似乎平淡无奇、没有实际意义，非常轻率地基于现实的政治约束。当然，有的多元系统论者也指出，后殖民翻译理论过于强调人们之间的差异和负面的东西，后殖民翻译理论家（或只是尼南贾娜？）在讨论政治和权力差异时走得太过头了。^②

赫尔曼指出，系统只存在于系统理论之中，它们没有本体论地位。伊文-佐哈尔在他的定义中强调多元系统的假设性本质。多元系统论受制于一系列二元对立，如经典与非经典、中心与边缘、原语与目的语等，而对二元对立之外的模糊、杂合、不稳定、流动、重叠、破碎的成分视而不见。^③ 勒弗维尔从几个方面批评多元系统论：第一，该论倾向于本质主义，好像系统真的存在一样；第二，该论沉溺于行话、图表和其他“科学的壮丽摆设”；第三，主要和次要活动之间的对立

①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42.

② Douglas Robinson,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 104.

③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 103, 119.

太多；第四，该论抽象的范畴经不起具体研究的考验。^①

根茨勒也总结了对多元系统的批评：第一，基于相对较少的证据而过分概括翻译的普遍规律；第二，过分依赖形式主义模式，它对翻译文本可能并不合适；第三，倾向抽象模式，轻视文本和译者面对的真实生活束缚；第四，所提出的科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客观的。^②

皮姆批评多元系统论，指出“系统”一词界定不清，有同义反复之嫌，同时该理论无视各国文化的异质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性作用，而后者却正是皮姆认为在翻译史研究中应大力发扬的。^③ 在批评多元系统之后，皮姆认为，翻译史研究的一大目的是，寻找翻译史中的“共有系统”（Regimes）。共有系统最早是由国际政治研究学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于1975年提出，指由部分国家或地区“共享的一系列想法、条例、制度、计划以及组织上和金融上的共同承诺。”皮姆认为“共有系统”这个概念能够提供比多元系统论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使翻译史研究在此框架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强调该概念特别有助于解释跨文化关系中的理解、交流和合作的产生过程。译者的翻译动机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译者的多重身份和从事翻译的多重目的决定了译者很少是单一的文化取向。这就暗示，译者的翻译过程并非全由外界社会某一种因素决定，这也使翻译史实更加复杂多样化，难以找

① Andre Lefevere, “Poetics (Toda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 42/42, pp. 193 - 194;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25.

②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 120 - 122.

③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p. 119 - 124; vi.

到把为殖民服务作为唯一动机的翻译实践，单纯的后殖民视角难以全面解析。论者相信单一文化系统不一定是翻译过程、翻译伦理和翻译可能性的主要决定者。至少还有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皮姆在论述共有系统理论能够关涉翻译理论时指出，一些理论家将翻译与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后殖民主义方面，但在译者应如何处理他们手中可能拥有的权力方面无话可说。共有系统理论至少可在跨越权力差异建立合作方面设定目标。合作可以在高度不平等的团体之间产生，主权国家在没有霸权强加之下也可以进行合理的合作，从非协商性的合理合作进入体制化的协商性的合作，进而设想了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在共有系统中，有些规范是对双方都有益的，能使双方合作。这将是共有系统的首要原理。^①这实际上已经跨出了文化系统而进入了社会系统，成为社会学的翻译研究了。古罗马与古希腊、阿拉伯帝国及其他者、中世纪的西欧与阿拉伯、辽夏金元清统治民族与汉文化之间的翻译，都可以放在共有系统论下进行考察。

张齐颜指出，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2000；廖七一，2000：68；谢世坚，2002）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但由于王东风与谢世坚都只是从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提出批评，而廖七一则是从该理论的论证方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论者从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等角度来探讨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翻译现象时的不充分性。该文认为，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不是来自两种文化地位的强弱，译入语与源语之间

^①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p. 124 - 131.

好比贸易的双方，虽说这种贸易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公平的，但贸易之所以能进行不是因为贸易双方的地位悬殊，而是源自各自的需求。^①张齐颜等人虽专论多元系统论的不足，实则与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反思有着某些不谋而合之处。

此外，姜艳的《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上海翻译》2006年第3期）、王洪涛的《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245页）等也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提出了批评性反思，涉及后殖民翻译。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近来对后殖民理论进行的批评性反思也为本书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铺垫。

三 批判意识的缺失

学术界后殖民翻译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吸收多批评少。目前，学术界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等文化转向以来的翻译理论提出反思的论著并不多见。从较传统的观点来看，后殖民译论太新、太边缘化，还未引起很多的批评性关注，这方面的论著发表很少，无论是好的批评，还是不好的批评。^②

在当前国内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孙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著作。该书从普遍与差异这一角度入手，探讨了翻译与权力、东方主义、民族主义、杂合等方面的关系。论者认为，翻译从来就是殖民征服、殖民统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① 张齐颜：《论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的不充分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Douglas Robinson,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 104.